



# 抗战时期的印尼华侨教育概观(1937—1945年)

□ 居玛丽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的黑暗时期。这一时期,印尼的华侨教育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之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日军在印尼推行奴化教育政策,以相对缓和的手段培植亲日思想。这一政策对印尼的华侨教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但印尼华侨教育界从未放弃抗争,广大华侨师生通过多种方式为祖国和印尼的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印度尼西亚 华侨教育

DOI:10.16743/j.cnki.cn45-1357/d.2016.02.056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1937—1945年),荷属东印度的华侨教育深受抗战形势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在1942年彻底沦陷以前,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的华侨教育经历一个短暂的快速发展时期,但这一局面在1942年印尼沦陷后彻底改变。日军采取血腥镇压和怀柔欺骗双管齐下的统治政策,将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纳入战争轨道,为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服务。印尼从此进入日本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时期。在教育上,日本侵略者采取奴化教育政策,印尼的教育因此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华侨教育从师资、生源、课程设置到教学管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印尼华侨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尤其是文教界人士,借教育声援国内的抗战斗争,并趁机扩大了华文教育的影响。

## 一、日军的华侨教育政策与措施

为了限制西方的影响,将“英美及荷兰之一切军事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诸势力完全毁灭。对日亲善,举大东亚民族共荣之实”<sup>[1]</sup>。日军在印尼实行奴化教育政策,成立宣传部,负责文教工作,对青年学生进行亲日宣传。<sup>[2][P414]</sup>并通过关闭学校、实施日语教学与奴化管理等措施来教育训练华侨,“培养其真切之大东亚精神”<sup>[1]</sup>。

### (一) 关闭学校

1942年3月13日,荷印当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巴城组建了大日本军政监部,此后政监部下令关闭所有学校,并严禁民众集会结社等,各华侨学校(简称华校)被迫停办,华侨子弟纷纷失学。

鉴于华侨在印尼并无政治野心,且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于是日军想要利用华侨以配合其侵略战争。故爪哇军政监部在1942年8月1日宣布批准印尼各地华侨小学开课,但复学的条件极为严苛。首先,限制使用原有校名,必须改用“某某城市华侨私立初等学名之名称”<sup>[3]</sup>。其次,教材必须使用经其审定合格的,凡是含有仇日或启迪爱国思想的课本都被禁用。此外,采用西

式教育的荷华学校全部被取缔,所有在荷华学校就读的学生必须转入华侨小学就读。华侨中学也一律停办。如此一来,巴城被允许复办的小学共有15所。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八华学校改名为“中华会馆民众学校”,学制为六年,分散在三个地方上课,开设有华文、日文、印尼文以及其他课程。(载于《椰城中华会馆五十周年纪念刊》,1950年)

雅加达中华中学的经历在印尼华校中是比较典型的。在经过学生减员、迁校避难后,中华中学不得不面临闭校。1942年3月6日,日军全面占领印尼前,李春鸣校长和董事们召开会议颁布五项决定:正分两校无限期停课;教职员工一律发给遣散生活费两个月薪水;外埠外岛来的寄宿生,能安全回去的准予回家,不能回去的暂留在宿舍由学校照顾;高中第一届、初中和高小第三届已临毕业的三班学生,以今年春季考试成绩作为毕业成绩,及格的一律发给毕业证;芝巴德分校及宿舍中残存的图书仪器用品等交给留驻芝埠的师生代为保管。这五项举措妥善安置了教员和学生,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学校的资产。8月时该校的附属小学获准复课,设有六个年级,共6个班。1943年有高小毕业生36人,1944年毕业生43人,1945年毕业生67人。(载于《椰加达中华中学二十五周年暨一九六四年毕业纪念刊》,1964年)

### (二) 日语教学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是抗战时期日军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一环。日军规定印尼华侨小学必须将日语列为主要必修课,禁止教授英文和荷文,但允许学习华文和印尼文。并开设了日文班,供小学教师就读,由华人担任讲师。<sup>[5][P2]</sup>虽然这一政策看似是对华侨的优待,但归根结底,只是为了便于日军推行奴化统治。这并非是恢复华文教育,而是将华侨学校作为实施奴化教育的场所,以相对缓和的手段培植亲日势力。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战事不断,加之年代久远,目前可见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印尼华校日语教学的具体情况。表1是日据时期雅加达华校的课程设置情况,除日语外大致与战前相同。

表1 雅加达华校课程节数标准(1945年4月25日修订)<sup>[5](P32)</sup>

年级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早操或朝会	(1)	(1)	(1)	(1)	(1)	(1)	
公民	2	2	2	2	1	1	
国语	读法	7	7	8	7	7	7
	作文	—	—	1	1	2	2
	写字	3	3	2	2	1	1
常识	历史	4	4	5	5	1	1
	地理					2	2
	自然					2	2
	卫生					2	2
算术	算术	3	3	6	6	6	
	珠算				1	1	
工作	劳作	2	2	1	1	1	1
	美术			1	1	1	1
唱游	体育	3	3	2	2	2	2
	音乐			1	1	1	1
印尼语	—	—	—	—	3	3	
总节数	24		29		34		

资料来源:巴城华校教师工会编,《教师之友(1946—1947)》,J1页。

### (三) 奴化管理

不仅是在课程设置上,日军还在学校的日常管理和训育中渗透其奴化思想,企图从思想上瓦解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复办的小学,其董事及教员必须签署尽忠于日军的宣誓书,才可重新回校管理和教学。华侨按规定每周要上纪念周,课前遥拜日本天皇,然后唱日本国歌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歌,再三呼“万岁”。节日时师生必须挥舞日本旗集会游行,或听“名人”的亲日演讲。<sup>[5](P91)</sup>对南洋华侨有研究的日本人,还主张让华校师生利用暑假赴日旅行,只收取半额费用,使其了解日本真实情况。<sup>[6](P76)</sup>这些措施旨在从学校的管理和训育入手,使华侨的后代“崇拜日本精神,以日本精神为指导精神”<sup>[1]</sup>。可见,日军极为重视华侨学校作为宣传工具的价值,认为华侨教育是刺激民族意识觉醒的原动力,绝不能放任华侨通过教育来增强民族意识,必须实行限制和压迫。<sup>[6](P205-206)</sup>而奴化教育正是从教学、管理和训育多方面打压和利用华侨教育的政策。

### 二、抗战时期印尼华侨教育受到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是印尼华侨教育持续发展和产生分化的一个时期,华侨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东南亚各国中位居第二,仅次于马来半岛。<sup>[7](P43,82,83)</sup>据巴城华校联合会的调查,1941年全印尼的华校已经达到500所,学生6.5万人。<sup>[8](P113)</sup>然而,日军南侵后,这一态势发生了急剧转变。

### (一) 华侨学校损失极大

战争中,众多华侨学校或是毁于炮火,或是校产遭侵占,校董和华校师生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日本军部于1942年4月中旬通令登记重要物资,派人检查各个仓库,华侨学校的物资因此遭到掠夺。其中雅加达中华中学购买的用来扩建学校的钢铁、水泥和天花板等物资,全部被征用。其在芝巴德分校的桌椅、图书等也被抢走,残存的图书仪器及家具等在1945年11月又遭到联军的空军轰炸,全部化为灰烬。

棉兰的苏东中学,校舍被日军据为兵营,所有图书仪器也在战争中散失。该校征集的十周年纪念刊稿件也流入卷烟厂,校舍门窗和精致的硬木桌椅全部被破坏。1945年8月日军投降之初,校舍又被英印联军作为兵营使用,连墙壁和地面都破败不堪。<sup>[9](P465)</sup>同在棉兰的敦本学校,其校舍被日军改做兵补食堂,一年后又改做警察训练所,后来又用来开设肥皂制造厂,原本整洁的校舍被破坏得面目全非。<sup>[9](P468)</sup>

除此以外,日军还采取暴力的手段,逮捕和杀害华校的董事、校长、教职员,甚至是学生。1942年9月20日,日军大检举,制造了史称苏岛最壮烈、最残酷的九·二〇事件。被逮捕和杀害的支持抗日的华侨中,就有许多是教育界贤达、华侨教职员和青年学生。他们被囚禁在棉兰、先达的监狱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各处,许多因受刑过度而死亡。“敦本学校学生周回生(福建人)被害于棉兰东郊的东蒙,伍华鏊(广东人)遇难于巴东花的谷,他们都是高小学生,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是被汉奸出卖而被捕杀的。”<sup>[9](P468)</sup>雅加达中华中学的校董和建校人之一的麦炳煊,被日军囚禁在武吉杜里的集中营,直到日军投降才被释放。校长李春鸣也曾被日本军部成立的“华侨班”传唤调查。<sup>[10](P21)</sup>

### (二) 华校的教学质量、就学率降低

由于被迫接受奴化教育,许多有民族气节的华校教师不愿配合,他们或是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敷衍教学;或是辞职改行,从事商业或耕牧,还有一些教师为避战火返回祖国。大量的教师离职造成师资匮乏,而新聘请的教师和助教大多是本地初中或高小毕业生,文化程度低,仅为滥竽充数,教学质量大为降低。<sup>[3]</sup>

大量的华校被日军关闭,中学教育停滞,有许多小学也因为师资和生源缺乏、校舍残破,无法继续开课。此外,许多爱国华侨不愿子女接受奴化教育,宁愿辍学在家。这些因素导致华侨就学率下降。<sup>[11]</sup>就连当时印尼华侨教育最为发达的爪哇地区,在日据时期的就学率也很低。由表2选取的日据时期爪哇几个主要城市的学校调

表2 日占时期爪哇岛华侨学校调查表<sup>[5](P93)</sup>

地名	学校数(所)	教员数(人)	学生人数(人)			华侨人口(人)	就学率(%)
			男生	女生	合计		
万丹州	1	7	188	140	328	5375	6.1
雅加达州	10	39	1076	677	1753	65319	2.7
井里汶州	1	18	400	263	663	35684	1.8
北加浪岸州	5	58	1557	1127	2684	28102	9.5
三宝壟州	6	61	1901	1160	3061	44695	6.8
茉莉芬州	3	24	490	320	810	11429	7.1
波佐纳哥罗	2	12	273	137	410	10253	4
谏义里州	7	70	1543	1072	2615	28622	9.1
泗水	7	91	2583	1415	3998	53132	7.3
马都拉州	4	18	429	228	657	6087	10.8
日惹	6	45	1135	840	1975	13159	15.0
梭罗	16	93	1923	1349	3272	23686	13.8
雅加达市	28	299	7875	4910	12785	11520	11.5
全岛统计	172	1464	35815	23716	59531	680695	8.7

资料来源:管渝《印尼华侨教育史片段》,载《椰城华校教师公会月刊》(缺刊期),出版时间不详,第54页。

查情况及全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争和奴化教育政策不仅破坏了华校的教学场所,也残害了众多支持祖国抗日的文教届人士和无辜的师生,导致华侨教育生源和师资缺乏,教学质量下降,就学率降低。而且中等教育的停办,使得小学毕业生和中学生无法继续求学,对华侨教育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给战后华侨教育的恢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 三、印尼华侨教育界的抗争

在中国抗战期间,印尼各界华侨都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其中华侨教育界就是抗战的一支先锋力量。不仅有教育活动家们,许多普通的华侨师生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通过教学、宣传和募捐等方式作斗争。

#### (一)坚持教学

尽管战火纷飞,许多学生也随家长逃散避难,但仍不乏华侨教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他们不顾生命的威胁,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教学。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他们的抗争手段。管渝的《印尼华侨教育史片段》记载:此时华侨学校没有任何补贴,仅靠学费和捐助维持办学,所以教职员的工资极为低廉,每月平均49.32盾,生活十分窘迫。归国后曾担任锦州市侨联常委的爱国华侨刘燕球(广东人),在回忆她的印尼生活时提到,华侨小学复办之初,学生和教师都很少。她的父亲认为不加强教育会使华侨的后代被淘汰,便串联一些热心的华侨,整顿侨校,筹集经费,并前往华侨家中,给大家讲道理,做动员工作,还带头送自己年仅六岁的女儿上学读书。在他的带动之下,不少华侨子女纷纷背着书包重上课堂。<sup>[9](P424)</sup>华侨小学得以在动乱中继续兴办,这些热心教育

的华侨先贤和甘于贫苦的教师们功不可没。

但由于华侨中学的停办,大量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失学。雅加达一些华侨中学的教师为了帮助解决一些中学程度华人青年的复习与进修问题,决定齐心合力创办补习班和讲习所。1943年,在当时华侨公会主席刘宜应(广东梅州)等人的倡导下,<sup>[12](P47)</sup>华侨数理化讲习所获日军批准成立,地点位于雅加达大南门火车站左边对街。讲习所主任为温湘兴,教师有韦同芳、温鸿琳、刘宏谟、刘宏谦、胡秀莹等,均为战前雅加达华校著名数理化教师。<sup>[4](P2)</sup>讲习所为华语教学,未设日文科。共有甲、乙、丙三个班级,甲班为初中三年级,学习时间为一年,乙班为初中二年级,学习时间两年,丙班为初中一年级,学习时间三年。甲班有1个班,乙班和丙班各有2个班,学生共有200多人。<sup>[5](P92)</sup>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停办。从数理化讲习所的班级和学制不难看出,它类似于一个只开设理科课程的临时学校,适应了战时印尼华侨教育的特殊需求,也为战后华侨中学的恢复输送了一批优秀的生源和教师。

#### (二)宣传抗日

印尼华侨的抗日宣传自九·一八事件后就如火如荼展开了,1942年印尼沦陷以后,抗日的局势越发紧张,华校师生的抗日宣传也开始由街头巷尾转入地下。他们成立组织,利用学校的身份开展抗日宣传。早在印尼沦陷前,华侨青年就组织了青年互助社、青年“读书会”等团体,声援祖国的抗战。各地师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开展宣传,通过张贴宣传单、发表抗日演说、举行抗日演出等形式,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

1942年印尼沦陷后,日军的监管日益严密,手段也更为残忍,华侨教育界的抗日宣传随之隐秘起来。泗水华侨组织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大”),开办了华侨家庭补习班,派出懂印尼语的成员来进行教学,争取一些土生华侨和知名人士参加抗日活动。<sup>[2](P420)</sup>其他诸如华侨抗敌协会、苏岛反法西斯同盟等组织,不乏教育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而且这些组织都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教育工作,不仅是在文化上,还在思想上培养和塑造他们,向他们宣传抗战的形势,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恶,提高青年学子和广大华侨的思想觉悟,为更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储备革命力量。爱国侨胞还经常以学校作掩护,聚集在一起,名为研究教学,实则商讨抗日的策略和行动,借学校这块阵地和教师的身份来宣传抗日。<sup>[13](P424)</sup>

#### (三)积极募捐

七·七事变以后,华侨的募捐运动走向高潮,华侨



教育界的募捐更是卓有成效，是募捐队伍的一支主力军。各地华校师生热情积极，采用各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救助在战争中受难的民众和伤兵，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

印尼华侨师生的募捐类型多样，有月捐、义卖、义演等。学校组织幼年的学童逐户访问，请求继续每月寄赠捐款，成绩十分可观。义演义卖也是华校十分常见的募捐方式。义演常常通过收门票的方式来募集捐助，在早期总是同抗日宣传联合起来进行。曾任全国侨联主席、当时在巴城八华学校执教的张国基回忆说：“记得那时每逢农历除夕的夜市和元宵节等重大节日，学校师生就上街募捐，用事先准备好的鲜花向过路人插花劝募，我们还登门向有钱人家劝募或举行各种义演、义卖等。”<sup>[14]</sup>洪渊源也曾在自传里描述华侨学生募捐的场景，“一对对穿着校服的男女学生，女学生手里拿着鲜花或假花，男学生拿着写有‘慈善募捐’字样的箱子，女学生们把花别在行人身上，然后请他们捐款。学生们一直这样工作到下半夜，他们还相互竞赛，看谁募集到的钱更多”<sup>[15]P106</sup>。梅兰苏东中学第八附小的小学生谭洪务及林天福等人将平日积蓄献出，利用儿童节放假，合买虾饼，然后再去发售，将所得款项支援祖国同胞。其他各个学校都纷纷成立募捐队，共得款 1089.12 盾，汇回祖国。<sup>[16]</sup>1940 年的元宵节，雅加达中华中学开放教室和天台举行夜市，展览字画，义卖食品饮料，并在大街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吸引了众多的来宾，筹得三千多荷盾，悉数交给慈善赈济会汇回祖国，赈济灾民，并再接再厉捐献鸡纳丸交给上海红十字会。<sup>[17]P12</sup>1941 年的元宵节，华中师生举行第二次夜市义卖，募集捐款。此后，由于日军炮火的逼近而无法再举行类似的义卖活动。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印尼的华侨教育界从未放弃抗争。依旧有众多生活窘迫的华侨教师恪尽职守，加强华侨子弟的教育。许多爱国师生甚至直接加入宣传抗战的大军中，并采用各种方式积极募捐，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战时期，印尼的华侨教育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抗战之初，尽管一直遭受荷印政府的限制，举步维艰，但从侨校数量、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等来看，印尼的侨教正处于勃兴时期，并在整个南洋占据领先地位。而当战争的炮火燃烧到了南洋，印尼被日军占领，华侨教育进入了黑暗时期。在奴化教育政策下，华侨学校被大量关闭，日语教学和奴化管理对印尼的华侨教育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侨校毁于战火者众多，教学质量和就学率严重下降。但印尼华侨教育界为抗

战作出的贡献令人惊叹，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教学，传承华文教育，利用学校的便利和学生、教师以及校友的身份，联合起来宣传抗战，募集了大笔的资金支援祖国。

纵观抗日战争期间的印尼华侨教育可以发现，尽管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但印尼华文教育的薪火未灭，华文教育的影响也趁机扩大，为战后的恢复和改革埋下了伏笔。

#### [参考文献]

- [1][日]守安新二郎.大东亚建设与华侨教育[J].补庐译.教育建设,1942,(1-2).
- [2]黄昆章.李学民.印尼华侨史(古代至 1949 年)[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3]李全寿.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史[J].新加坡南洋学报,1959,(1-2).
- [4]刘宏谦编.思母集:联中、巴中、雅中校友史片断[M].广州:巴中校友编委会出版,1993.
- [5]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6]崔丕.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G].姚玉民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7]郁树锬主编.南洋年鉴[G].新加坡:南洋商报社有限公司,1950.
- [8]朱敬先.华侨教育[M].台北:中华书局,1973.
- [9]黄鹤.棉兰华侨教育追忆[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华侨华人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10]李北昌主编.赢得清风飘两袖,漫夸桃李遍南天——记椰加达中华中学创立经过[M].中华文苑编辑委员会,1988.
- [11]廖建裕.印尼华人教育史略[J].杨启光译.东南亚研究,1986,(04).
-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第 9 辑第 2 册)[M].广东:梅县文史委员会,1993.
- [13]刘燕球.我的第二故乡——山口洋[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华侨华人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14]张国基.抗日战争中的华侨[J].中国建设,1985,(08).
- [15]洪渊源.洪渊源自传[M].梁英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 [16]苏岛儿童在庆祝儿童节中不忘祖国战区难民[J].华侨战士月刊,1938,(05).

[作者简介] 居玛丽(1990-),女,江苏连云港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013 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编校 / 唐燕敏】